

MA BO-YING

中國醫學文化史

上卷

马伯英 著

A HISTORY OF
MEDICINE IN
CHINESE CULTURE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

卷

马伯英 著

中國醫學文化史

馬伯英題



MA BO-YING

A HISTORY OF
MEDICINE IN
CHINESE CULTURE

 上海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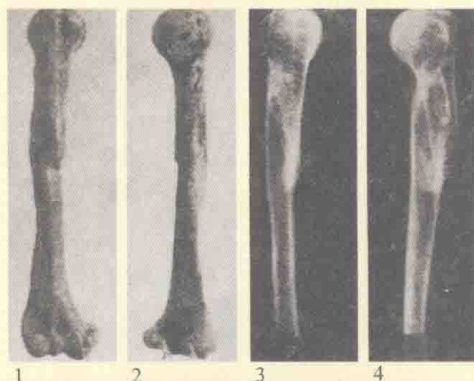
中国医学文化史

上
卷

上海文化发展基金资助项目



图一



图二



图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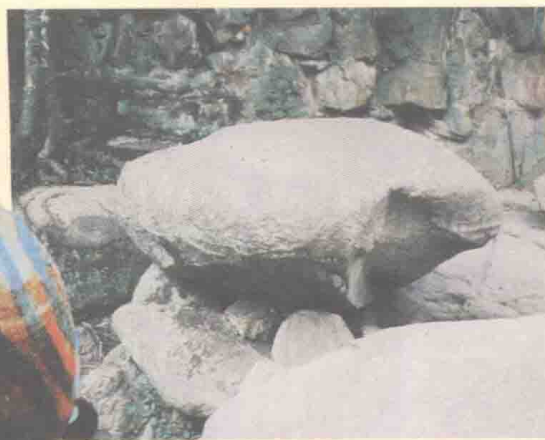


图四

- 图一 山顶洞人女性的头骨及其伤痕
- 图二 山东曲阜西夏侯新石器时代人骨骨折愈合(墓2), 右肱骨(1)前面观(2)后面观(3-4)骨折部位X线摄影。
- 图三 新石器时代头骨有愈合的穿孔疮口
- 图四 江苏邳县大墩子新石器时代人骨(墓316号), 左股骨骨折X线摄影(内侧视)。图中白色三角为一骨瓣残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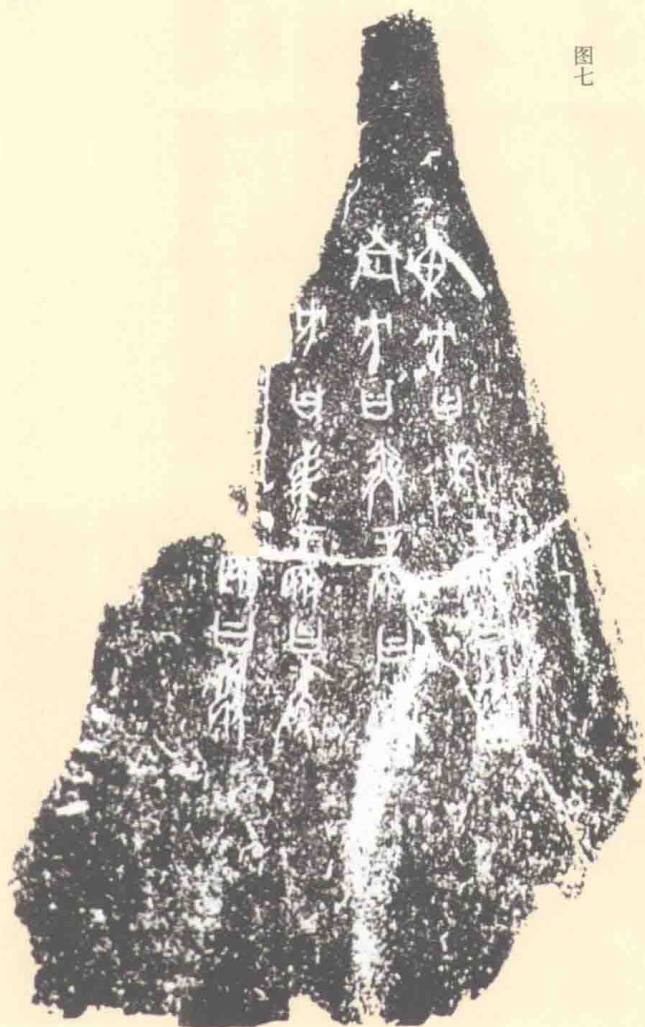


图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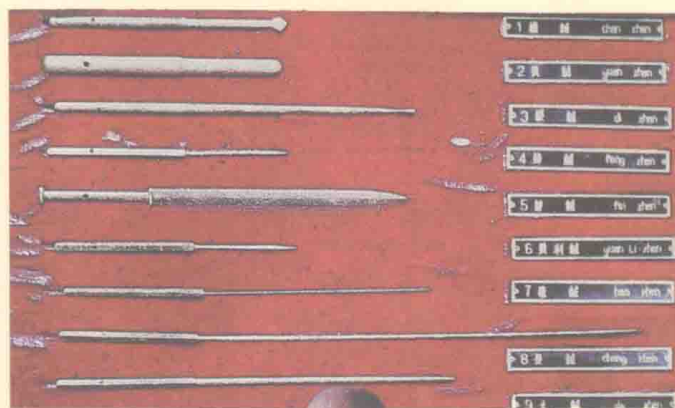


图六

图五 裸体人像壶
图六 苏州得子石
图七 卜骨图



图七



图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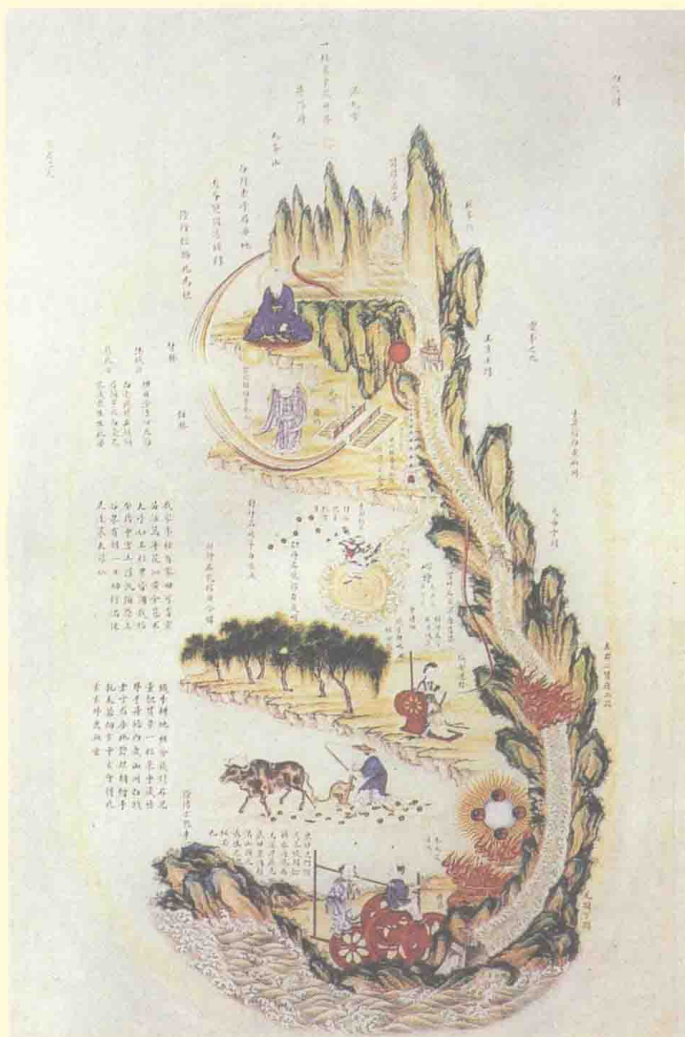
图九

图八 九针（复原品）
图九 宋代天圣针灸铜人（复原件）
图十 内蒙古包头出土骨针



图十

图十一 内(景)经图
图十二 今日民间祀神图



图十一



图十二



图十三

图十三 (出售) 阳具代用品
图十四 足恋
图十五 同性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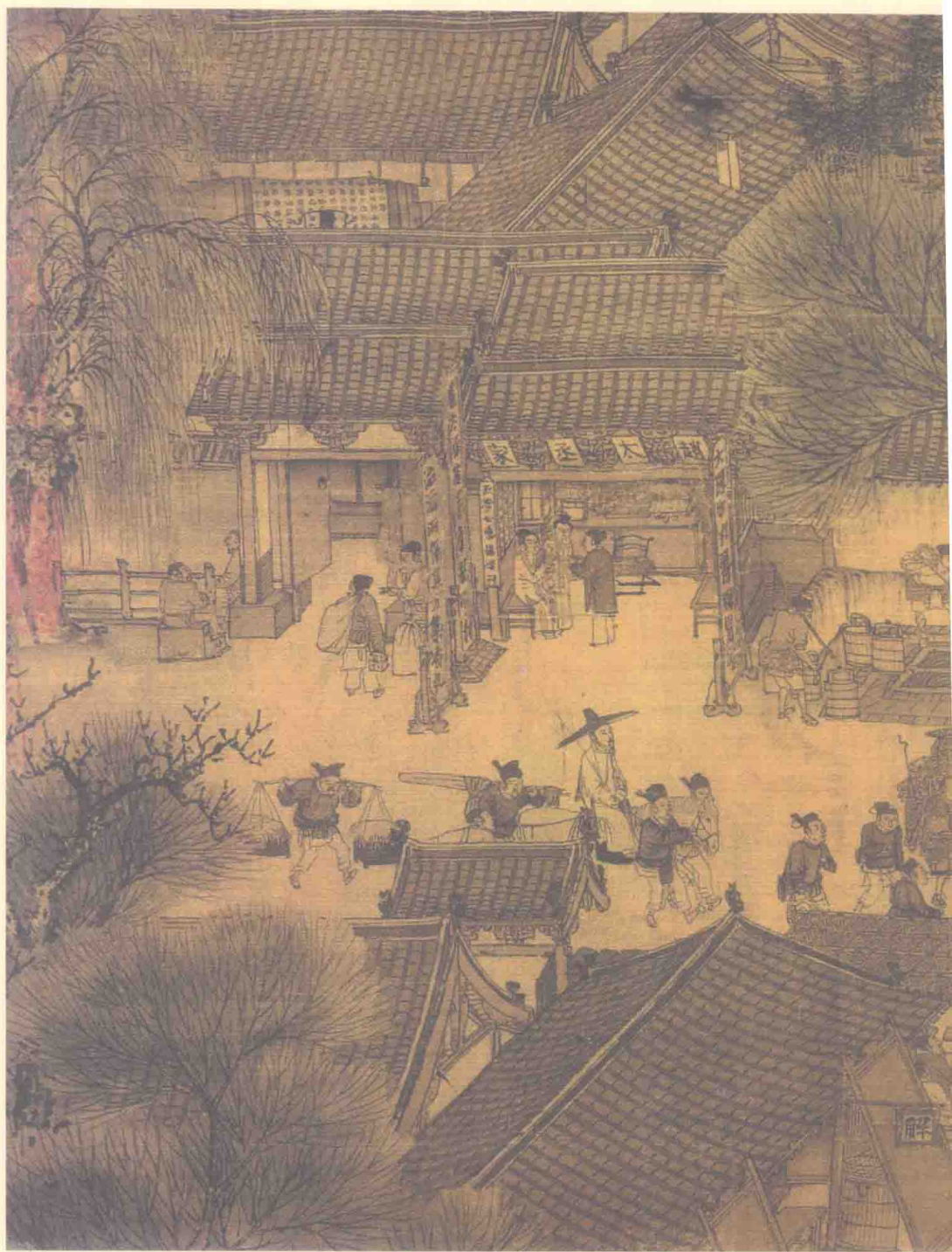


图十四



图十五

图十六 《清明上河图》赵太丞医家





图十七

图十七 得医图（盛唐 莫高窟217窟）
图十八 明·熏炉



图十八



图十九 孙思邈坐虎针龙图

献 辞

谨将本书献给我已经仙逝的父母。他们一介平民，几乎目不识丁。但正是他们的滋养，使我今天小有成就。

同时将本书献给剑桥大学罗宾逊学院后院菩提树下安眠的李约瑟博士（DR JOSEPH NEEDHAM）和鲁桂珍博士。他们聘请我作为《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 CIVILIZATION IN CHINA）医学卷的合作者到英工作。本书是我在李约瑟研究所的研究基础上后续之作。不是他们，我可能没有机会以世界性的视野重新审视中国医学史。在剑河旁冥思，我豁然悟出引入人类学方法和成果研究医学史，可以开拓史学研究的新境界。于是，我这么说了，做了。今天，人类学进入史学研究领域已经成了学者们的共识。

总序

2006年4月14日，登维苏威火山，访庞贝遗址，忽发思古之幽情，写了一首诗：

庞贝废墟千百年，
维苏依然起白烟。
扶杖登陟气犹喘，
拾石揣怀心渐平。
沧桑谁能留故物，
历史最是欺新人。
回眸夕阳浮红霞，
万古终惜一片情。

面对历史，我们都是新人。历史的真相，隐藏在那些千百年的残留物中，我们应当如何去探寻它们？证据常新，方法常新，辨识常新，结论常新，这就是历史研究不断深入的过程。历史研究的基础是证据，证据史学（Evidence Based History, EBH）是史学界一直贯彻的传统。发现证据，就是找出“有什么”。那里有过什么，历史上存在过什么。文献的考索、考古的发掘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证据搜集方法。口述历史是较迟出现的方法。但是，过往有一种方法不为历史学家所重视，那就是文化人类学的方法。1988年我在美国圣地亚哥召开的中国科技和医学史国际学术会上发表论文，提出了这个问题。嗣后我在研究中国医学文化史中应用了这一方法。现在，这一方法已为史学界广泛采用。此方法的基本点有二：田野调查和将人类学家的研究成果应用到历史研究中来。其好处是，发现了一些过去不受重视或忽视了的证据。换言之，文化人类学方法有助于找出那些隐匿在表象后面的真

实，发现新的证据。

找到证据，此证据是真是伪？需要辨识和判断。去伪存真，需要历史学家的智慧，动用史鉴和史识功夫。这也是史家的基本功。除此之外，慧眼识珠，又是另一种高明。比如，一般来说，孤证不受支持。然而，有时未必尽然。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还原到那个时代的情景中去，找出事件之间的特殊联系方式，就能帮助“沙里淘金”，有些孤证也就因之不孤。鉴别成功，就弄清了“是什么”的问题。所以，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对此亦有助益。

经过以上的努力，一个新的结论就翩然而至。然而，史学家还有个责任，是要回答“为什么”。历史事件需要解释，才能阐明真理，找到一些规律以警示世人或吸取教训。这不是很容易办到的。有一次，一位年轻学者在国际会议上对中国科技在近代为什么落后于西方的问题作出解读，说其中一个原因是中国人只学人家技术，不学理论原理。举的例子是19世纪初牛痘传到中国，学到了方法，却没有学到免疫学原理。我场下悄悄对她说，那时西方免疫学还没有诞生！她的愕然，一方面是对史实缺乏了解，另一方面是对那时代的科技文化状况没有全面把握。回答“为什么”，还是应该回到时代的情景中去，了解怎样发生、怎样结束，找出各种相关因素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从事件的全过程着手，才能真正知道因果关系、影响关系或其他关系。在此一层面上，文化人类学也是很能帮上忙的。解析史学近些年来日趋走俏，但正如朱维铮教授指出的，连“是什么”都没有搞清，怎么能侈谈“为什么”的问题！我则加上一条：连“有什么”都不知道，或知道得不完全，又怎能谈“是什么”、“为什么”！

如是，则历史研究的三部曲：有什么—是什么—为什么，都可以应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而且在每一部曲，均可有所斩获。

以上我强调的是文化人类学作为一种方法论可以并且应当运用到历史研究中来。这是在原有史学研究方法论基础上的加强，但并非取代。有意义的是，与自然科学的研究一样，每一次方法论的突破，总是带来科技进步的跃迁。在社会科学、历史学的研究领域，也应是如此。这是我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倡将文化人类学引进到历史研究中的原因。

文化人类学涵括的范围很广，有一些是大家已经比较熟悉的，比如考古学，几乎每一位历史研究者都会利用一切考古新发现作为研究的新证据。但是，历史

学家比较不熟悉的诸如作为文化人类学强项的田野调查方法、原始思维和巫性思维研究、民族学、语言学等等，却正是发现、甄别、解析新证据的重要方法。史学研究者有必要补上文化人类学这一课。现在，西方的医学史专业研究生，如果论文中不包含人类学方法内容，其论文得不到及格分数，可见其受重视程度。史学家有一个比人类学家讨巧的地方，就是研究历史的学者可以利用和应用人类学家的成果，比对历史上存在的现象，从而认识该种现象的本质。历史学家不需要也不可能事事都去长时间地做田野调查才得出结论。善于借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成果，是做学问的一个窍门。

* * *

1985-1988年间，我应李约瑟博士和鲁桂珍博士之邀，在剑桥作为他们的合作者，帮助完成《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六卷的医学部分撰写。有一天，他的秘书、美国学者 Gregory Blue 博士与我聊天，问我：你看李约瑟的研究还有什么缺陷没有？我回答，他的研究是划时代的。将世界看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眼光扭转过来，发现古代世界重大的发明、发现，有一半以上是中国人创造的。他做的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成就史。他的位置无人可以替代。但是，有一个问题他没有涉及，也许是因为年龄和精力的原因，他未能分身顾及。那就是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的实际功能和社会效益问题。举个例子，我找来一个中国人，比你们美国人个子都高。然后说：中国人个子比美国人高。就这个人来说，这话没错。然而，就整体而言呢？美国人的平均身高显然比中国人高很多。在剑桥的第三年，我自费申请到剑桥大学科学哲学史系做访问学者，那里的学者们的兴趣是探讨“为什么”的问题：有成就，为什么会有成就；有问题，为什么会有问题。大家知道，李约瑟提出过一个问题，就是近代科学技术革命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发生？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困惑”（Needham's Puzzle）。大家几乎都从社会和文化因素来寻找原因。我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想的是中国古代科技成就与西方科技革命可以在一条线上发生吗？不是一家人，不说一家话。席文教授也许就是从这一角度认为：这根本就是一个不能成立的问题。那时我与许多科学哲学史系的朋友接触，就便看了些文化人类学的书。我悟出一个道理，中国的科学技术有自己的轨迹，要在自己的轨道上才能起飞。中医学是一个典例。

我因此通过对全部中国医学文化史的研究，得出了中医学的本质是朴素的生态（包括自然、社会生态和心理环境）医学适应理论，而这一理论在卫生预防、临床施治和延年益寿的实践中具有切实可用而有效的特质。这是本书最重要的结论。这些研究成果没有写进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一方面是当时想法没有十分成熟；加以鲁桂珍过早谢世，我写的内容无人译成英文。李约瑟因此改变计划，邀请我 1993 年第二次到剑桥，帮助校改他们原先发表过的中医史论著。我为之改正二百余处，但就个人研究成果而论，我无法加进我的思想。那半年里，席文教授没有来剑桥，我们没有沟通的机会。他作为编辑，后来写了很长的前言，表达了他的思想，我那时并不知道。我的学术思想，因此与他就又不是一回事了。后来在新加坡召开的第九届东亚科技和医学史国际研讨会（1999）上遇到席文教授，他跷起大拇指对我说：“你的《中国医学文化史》很棒！你是 Number One！”他是很少夸人的。他这回是第二次夸我了。第一次是 1986 年，答法国法兰西学院汉学家 Catherline Despeux 问“谁在中国医学史研究方面最好”的问题时说：“马伯英。”法兰西学院因此邀我去作了一次讲座。从他对我著作的欣赏看，其实我们的心是相通的。我们都看重医学史的研究要放在文化大背景中去考察，所有历史成就或历史问题，只有在社会文化的关系中才能解析出真实的面目和答案。

* * *

检阅我自己医学史研究走过的历程，有三个阶段特别重要。1978 年我考上“文革”后首届研究生进入中医研究院医学史专业学习。这三年最大的好处是拜中研院院长季钟朴和医学史研究室主任李经纬老师之赐，我们能呼吸学术上的自由空气。那时第一年是在北京中医学院修习《内经》、《伤寒论》、《温病学》等经典，由任应秋、王玉川、刘渡舟、赵绍琴等名师指点。第二三年除了医学史、科技史的一些基础知识外，就全由研究生自己琢磨着做研究。题目自选，材料自找，直到写出论文方交导师审阅。我那时的兴趣在中医理论的研究，想弄明白中医不同于西医，却为什么如此有效。这种有效的经验是我在“文革”十年期间自学中医并在临床疗效中体会到的。那时方圆几十里没有不知道我的医名的。我是靠中西两法治愈病人而得名的。作为一个本身是西医师的人，如果不是亲身体